

中外文化与文论

Culture Studies and Literary Critique

第 10 辑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
四川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研究所
四川教育出版社
主办

文学性问题
讨论专辑

四川教育出版社

中外文化与文论

ZHONGWAWENHUAYUWENLUN NO.10

第10辑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3年·成都

中外文化与文论

ZHONGWAWENHUAYUWENLUN NO.10

第10辑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3年·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外文化与文论. 第 10 辑/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3

ISBN 7-5408-3955-4

I. 中… II. ①曹…②吴… III. 文化—研究—世界—文集 IV. G1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2411 号

中外文化与文论 第 10 辑

责任编辑	穆戈
版式设计	王凌
封面设计	王一丹
责任校对	吴婷
责任印制	黄萍
出版发行	四川教育出版社 (成都市盐道街 3 号 邮政编码 610012)
出版人	唐瑾怀
照排	四川大学树德电子工程公司
印刷	成都书林印刷厂
版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8.75 插页 4
字数	345 千
印数	1-1000 册
书号	ISBN 7-5408-3955-4/I·43
定价	29.00 元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调换。电话 (028) 86660101

卷首语

为什么要讨论文学性

曹顺庆

文学性是文艺学建构学科理论的逻辑核心。

由于该学科理论预设的局限，自 20 世纪中期以来，文学终结论、比较文学消亡论和文学理论、美学乃至理论的终结之声不绝于耳。

最严重的问题是：如此建立的文学理论的知识体系已从它和生活世界、文学实践的血肉关联之中疏离出去，它不再同活的生活世界直接相关，甚至不再同当代社会的情绪表达、精神关切直接相关。由于如此，文学理论日益成为一种知识学的研究对象而只在小圈子里被谈论。在当代社会，有影响力、有思想含量的谈论都不是关于文学性的谈论。

另一方面，作为学科理论的逻辑核心，文学性概念又决不是可以随意丢弃的，因为丢弃或者更改都意味整个学科理论的坍塌或失度：它将失掉现代西学之谈论文学的全部分类学背景和逻辑预设，使以文学、文学性为核心的知识话语、概念与语词家族丧失意义边界，甚至使理论对文学相关性的思考难以命名、成思和成言。

由于生活世界的急剧变迁，文学理论的上述悖谬性处境越益加深。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是中国文论的当代处境，尤其是并且首先是作为学科的西方文论的当代处境。文学理论未来的命运如何，实有赖于对此处境如何面对。

本期“文学与当代生活世界”专辑是作者诸君和编辑部同仁对此处境的一次探问。不敢说我们已经找到了路或者找对了路，只能说是在问路。

目 录

文学性与文学理论的悖谬处境

- | | | |
|----|---------------------|-----|
| 1 | 主持人语 | |
| 2 | 白色的文学与文学性 | 余 虹 |
| 8 | “文学性”扩张与文艺学自我救赎的可能性 | 马 睿 |
| 27 | 文学性与文学理论的悖谬 | 冯黎明 |
| 34 | 论王小波对文学性问题的思考 | 王婷婷 |

文学性与当代生活世界

- | | | |
|----|-------------------|-----|
| 43 | 主持人语 | |
| 45 | 文学性及其在当代生活世界的角色变迁 | 张 法 |
| 52 | 时尚读本：当下小说创作的新型品种 | 李俊国 |
| 61 | “萨哈夫”：伊拉克战争的文学产品 | 惠 鸣 |
| 70 | 麦当劳：一个文学故事 | 龚小凡 |

文学性与文化研究

- | | | |
|-----|-----------------------|---------|
| 77 | 主持人语 | |
| 80 | 文学及其语言 | 曹顺庆、蒋荣昌 |
| 91 | “文学性”的用语：是学术界定，更是学理诉求 | 周启超 |
| 103 | “新”的历史与文学性的衍生 | 赵志义 |
| 111 | 文学性的身份认同 | 任 真 |
| 120 | 当代“讲述”与文学幽灵 | 张三夕 |

文学性概念的知识学考索

- 127 主持人语
 129 后现代“文学性”消解的文化症候 王岳川
 143 文本语义结构的朦胧之美 支 宇
 162 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性”概念 罗 婷、王志勇

理论终结论与西方文论

- 175 主持人语
 177 理论与文本的悖论 王晓路
 187 历史之死 尼尔·路西 著 李 莉 译
 204 理论之死 尼尔·路西 著 祝远德 译
 223 批评之死 尼尔·路西 著 金学勤 译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新论

- 239 主持人语 曹顺庆
 243 乌有的大堤或在类与非类的界面上集结 吴兴明
 251 跨文化的文学关系研究 胡亚敏
 259 伯恩海默报告：世纪之交的比较文学 伯恩海默等 著 史冬冬 译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学性问题

- 267 中国古代文学性的领受及其存在之境 刘朝谦
 280 《文心雕龙》论“文”的方法论意义 李天道

295 编 后

文学性与文学理论的悖谬处境

栏目主持 吴兴明

主持人语

文学性确乎是导致当代文学理论一系列理论悖谬的逻辑核心，但是要注意，这仅仅是作为学科的文论或仅仅是针对文艺学的学科建构而言。实际上，关于文学和文学性的思考向来就不只是学科的思考，甚至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从来就不是学科界域内的思想，例如中国古代的“文”的思考，海德格尔的诗性之思和鲍德里亚们对消费意识形态的思考。作为一个深受审美救世说之熏染且以之为无意识精神背景的人文知识分子，我总觉得对文学性及其在当代世界撒播的定义式的捕获是一种细枝末节的思考，一种似乎是纯技术性的思考。在此，我想起了冯宪光教授在考虑出这本专辑的时候一句善意的提醒，他说：在今天讨论文学性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当前不是最需要学科视野的挪移或修补，而是需要思想。

在当代思想史上，人文学的学科和思想常常走着不同的路，况且一种企图从外部的事实性关联去勾勒文学性的做法也已经深重地违背了现象学精神。但是，在一种大思想没有涌现的背景之下，我们又似乎只能抓住学科，抓住学科理论悖谬的症结去清理、还原、挪移、修改——这毕竟也是踏踏实实、言而有据的推进。

或许，一种真正的新思想会在清理的深微处电光火石般地照亮或滋生？

白色的文学与文学性

——再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

余 虹（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

在去年发表于《文艺研究》上的一篇文章中，我谈到一种看法：后现代转折从根本上改变了“总体文学”的状况，它将狭义的“文学”置于边缘，又将广义的“文学性”置于中心，我名之为“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的统治”。面对这一巨变，传统的文学研究如果不调整 and 重建自己的研究对象，必将茫然无措，坐以待毙。

所谓狭义的“文学”指的是作为一种艺术门类和文化类别的语言现象，它的概念内涵主要由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来的形式主义文学批评所规定，其外延通常指诗歌、小说、戏剧文学、抒情散文。如此这般的“文学”在图像时代的今天彻底边缘化了。但是，发人深思的是，在狭义的文学边缘化的同时，广义的“文学性”却中心化了。在后现代场景中，我们稍加留神，就会发现今天的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宗教活动、道德活动、学术活动、文化活动、公开活动和私下活动是多么的文学化。^[1]所谓广义的“文学性”指的就是渗透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并从根本上支配着后现代社会生活运转的话语机制，这种机制显然不是狭义文学所独有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我想以“总体文学”这个概念来涵盖“狭义的文学”和“具有广义文学性的非文学的话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拓展文学研究的领域，并回应后现代对传统文学研究的挑战，而不是简单地“逃离文学”和“转向”别的领域。

就此，我设想了一种“文学研究内部的转向”以重建后现代处境下文学研究的对象，即从狭义的文学研究转向广义的总体文学研究，从狭义的文学性研究转向广义的文学性研究。在此的关键是：将“广义的文学”和形式主义者发明的“狭义的文学”区别开来，将“广义的文学性”和形式主义者发明的“狭义的文学

性”区别开来,从全新的角度重提文学和文学性的问题。

提到“文学”与“文学性”,我们会想到形式主义的文学批评。其实,20世纪以来的“文学”与“文学性”研究有两大思路:其一是以“文学/非文学”的二元对立为前提预设,以诗歌、小说、戏剧文学等“文学”经验为对象的文学与文学性研究,这是形式主义的思路,我将此称为对了然的文学与文学性之研究;其二是解构了“文学/非文学”的二元对立,以全部话语为对象的文学和文学性研究,这是非形式主义的思路,我称之为对隐蔽的文学和文学性(或“白色的文学与文学性”)之研究。

在20世纪留给我们的知识传统中,“文学”与“文学性”的问题几乎是形式主义的专利。乔纳森·卡勒在《文学性》一文中回顾了 this 专利史。卡勒认为文学性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文学”的问题,这一问题可从两个角度来加以理解:一,“关于文学的一般性质”;二,“文学与其他活动的区别”。^{[2](p.27)}其实,确定文学的一般性质就是为了将其与非文学的活动区别开来,而明确文学与其他活动的区别也就是为了确定文学的独特性质,因此,这两个问题指向的是同一个任务,即要在众多的话语中划出一块被称为文学性的话语领地来安顿作为一门科学的“文学研究”。

形式主义研究文学性的思路主要受三大因素制约:现代职业分化及学科分类目标、美学旨趣和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卡勒认为文学与文学性的问题缘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欧洲。“我们谓之曰文学作品的创作已经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然而,关于文学的现代思想,仅仅可以上溯两个世纪。直到19世纪,‘文学’以及欧洲其他语言的类似说法,总体上仅仅意味着‘文章’,甚至‘书本知识’。在莱辛自1759年起发表的《关于当代文学的通讯》一书中,‘文学’一词才包含了现代意义的萌芽,指现代的文学生产。史达尔夫人的《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简称《论文学》)则真正标志着现代意义的确立。……19世纪末以前,文学研究还不是一项独立的社会活动:人们同时研究古代的诗人和哲学家、演说家——即各类作家,文学作品作为更广阔意义上的文化整体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成为研究对象。直到专门的文学研究建立后,文学区别于其它文字的特征问题才被提出来。”^{[2](p.30)}

19世纪末,欧洲社会的职业分化和学科分类相互激励,出现了以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为专业的人,这些人必须确立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以便在学科分类的现代知识格局中证明自己工作的合法性,进而在巨大的知识场域和职业市场上瓜分出并占据一个独立的领域。这些以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为专业的人如何来确立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呢?美学和现代语言学为其提供了启示与限制。美学(感性学)启发他们注意文学作品与人

的感性经验之间的关系，使他们发现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的显著区别，即后者使人们失去了对语言和事物的原初感知，而前者则恢复和加强了人们对语言本身的感知，以及对所描写的事物的感知（即俄国形式主义者所谓的“陌生化”效果），于是他们认为具有审美（感知）功能的作品是具有文学性的作品，并将“审美/非审美”确立为区别文学/非文学的坐标。

接下来的问题是：文学作品的审美功能从何而来？以什么方法可以客观地对此加以研究？现代语言学的形式结构研究为此提供了范例。循此思路，文学与文学性的问题被圈定在语言形式手法的领域，研究者们发现对语言的特殊使用可以使一段话语或一个文本具有审美功能，即引起人们对语言本身和被述说的事物的强烈感知。因此，不必研究作者的创作心理和作品的内容题材，只须研究文学对语言的特殊使用（包括结构主义对语言使用惯例的研究）就能揭示文学性的秘密。

就此而言，文学与文学性的问题在形式主义那里由三个潜在的维度所控制：现代学科建制的维度、美学的维度、语言学方法论的维度。这三大维度的合力使文学性的问题变成了专属于感性审美话语领地的语言技术问题，而感性审美话语指的是“文学”，故“文学性”问题就只是“文学”内部的问题。

其实，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门类（以审美为目标）的狭义的“文学”和用来描述话语的某种审美品性的“文学性”是两回事，我们说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是狭义的“文学”而不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是狭义的“文学”，但我们很难说后者是没有文学性的。狭义的“文学”是一个艺术类别，“文学性”却不是狭义的“文学”的专有属性。

德里达曾说：狭义的“文学”是一种现代发明，而文学性却与文字一样古老。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形式主义的文学性研究是狭义的“文学”这种现代发明的一部分，甚至是关键的部分，因为只是通过形式主义的文学性研究，现代“文学”的理念才真正确立起来，现代文学教授（最典型的是英美新批评时期的大学文学教授）才有了特殊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才能提供特殊的知识，才是一个有理由的合法职业。然而，形式主义将文学性的研究严格局限在狭义的“文学”领地之内，从而使文学性的研究和现代文学理念的确立遮蔽了一个更为深广的文学与文学性问题，即非文学话语的广义文学性及总体文学的问题。

其实，在19世纪以来的西方思想史上，对非文学话语之文学性和总体文学的思考并不缺乏，只是这些思考并未引起人们的真正注意。这或许是因为非文学话语的文学性和总体文学太隐蔽？或许是因为对它的思考从未学科化？

德里达说哲学是白色的神话。我们知道，在古希腊，“神话”即诗，而古希腊的诗与后世的文学有某种亲缘关系，故德里达之说也可译为白色的文学。说其“白色”指它是看不见的文学（神话），因为我们的俗常之见早已被哲学所铸造，哲学一再宣称它不是文学，并通过攻击文学来成就自己。哲学说文学是虚构的神话，是不当真的修辞游戏，是“用墨水写在纸上的”歪曲存在的文字（墨迹替代、遮蔽了它要说的存在），而哲学是认真严肃的真理性话语，是“用心灵写在心板上的”再现最高存在的文字（它是白色而透明的，可透显出存在）。德里达说哲学的自诩是靠不住的，只要我们在哲学上面播撒一些显示剂，暗藏其中的文学性便会显示出来。德里达的解构就是这种播撒，他让我们发现哲学和它攻击的文学一样，其话语的根是修辞“隐喻”，其写作的文字是墨迹斑斑的“分延”（différance），其意指的“替补”运动没有终止，其再现是“不再现‘什么’的再现”，其所谓的“真理”也只是“虚构”。简言之，哲学非它，就是它所攻击的文学，或曰“原型文学”（archi-literature）之一种。德里达的“原型文学”即“总体文学”，它包括了狭义的文学和别的非文学的文字文本。

其实，从事这一播撒工作的不仅仅有德里达，还有马克思、尼采、罗兰·巴特、保罗·德曼、海登·怀特、鲍德里亚等人。在西方，柏拉图以来的哲学统治是无所不在的，哲学与文学的对立还派生出形形色色的话语与文学的对立，这些话语通过与文学划清界线来逢迎哲学，从而分有真理的禀性，自诩为真理与非文学。

马克思以“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来分析当时的德国哲学、英国的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理论，他指出这些自诩为真理的理论不过是一些虚假意识，是从某种潜在的利益立场出发而对现实关系的想象的、梦幻般的表达。其实，这就是对意识形态之文学性的最早揭示。对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的文学性的揭示还必须提到罗兰·巴特。巴特也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他更注意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他用“神话”来称意识形态，将自己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名之为“神话学”。对巴特来说，意识形态就是“白色的神话”，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看不见的神话，而神话就是文学。

尼采虽然借颠倒形而上学在真理/非真理、哲学（道德、宗教）/文学（诗、艺术）之间制造的二元对立来攻击前者，但他在谈到一切话语都是修辞时则指出一切自诩为非文学的话语（哲学、道德、宗教）都是文学话语。保罗·德曼更为彻底地发挥了尼采的这一思想，他深入解构了语法（逻辑）与修辞之间的对立，将修辞揭示为一切话语中不可取消和不可排除的要素。在德曼看来，修辞性就是文学性的别名。

历史学家从来都极力宣称历史叙述是非文学性的，历史叙述可以真实地再现历史事实，但海登·怀特则告诉我们历史叙述也是白色的文学。历史叙述必须借助于文学性的叙述模式（悲剧的、喜剧的、反讽的……）和文学性的比喻修辞才有可能。跟历史事实符合一致的、惟一正确的、单数的大写的“历史”（History）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跟历史事实总有出入的、总有某种虚构性的复数的小写的“诸历史”（histories）。怀特提醒我们摆脱历史学幻想的有效策略就是将历史叙述当作文学作品来读。

人们通常认为经济、商业、消费活动是最为理性的活动，鲍德里亚则揭示了这些活动的文学性秘密。离开了文学性的运作，后现代的经济、商业、消费活动就没办法进行。在今天，一个成功的企业就是一个文学故事，一个成功的品牌就是一个文学神话，一种成功的营销就是一种文学活动，而一种后现代的消费就是一种文学接受。在此，文学性的成分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而是经济、商业、消费活动的核心。在虚构、修辞、抒情、讲故事的文学话语运作中，后现代的经济、商业、消费的“眩晕”被制造出来了，我们昏昏沉沉于其中。

当然，最“伟大”的文学莫过于政治和当代传媒。正是政治话语最为喋喋不休地（也最为无耻地）宣称自己绝对真实、真诚、可靠，它们“代表”正义和真理，替天行道（布什和萨达姆在最近的伊拉克战争中都这么说，前者代表上帝，后者代表真主），其实，它们究竟代表（再现，在英文中“represent”既指“代表”又指“再现”）什么人们永远也不清楚，但它必须让“代表”（再现）看上去就是那么回事。显然，政治话语最讲究（甚至比通常的文学话语还讲究）文学性的修辞、叙述和抒情格调（政治家常常琢磨让一个比喻、一个词、一种叙述、一种语气达到你不可想象的地步），它只有通过文学性的狡计使自己产生一种魔力，让人们觉得它绝不是文学虚构和游戏，让人们觉得它真实、真诚、可靠。政治话语是隐藏得最深的文学性话语，对此古希腊人比现代人老实，比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政治即修辞，而在西方古代，修辞学也一直被看做是政治学的一部分。不过，说政治是文学也并不必然暗含着对政治的贬损，正如对意识形态之文学性的认识那样，而是要更老实地看待政治，更深入地探究政治运作的秘密。现代传媒最热中的是“现场直播”，但观众从来就到不了“现场”，“现场”永远是一个没有真正所指的文学语汇，它是当代传媒语汇中的“上帝”。以“现场”之名无异于以上帝之名。

以上对文学和文学性思考的路向显然不同于形式主义，这种被理论界忽略但又十分重要的路向可以启示我们寻找后现代文学研究的对象。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尝试跨越现代学科分类的界限，将形形色色的人类话语经验作为总

体文学来设想，而不同的话语只是总体文学的特例，它们都具有文学性。如果这样，我们就可以将一篇社论、一条广告、一个企业的营销手册、一条新闻报道、一个理论甚至一个政治家、一个企业家、一个学术明星当作文学作品来研究。这种研究不是说被研究的对象只是“文学作品”，而是说可以对它的文学性加以研究，这种研究将有助于对其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道德的、宗教的意义之理解。因为，在宗教信仰和哲学信念日益式微的后现代，话语的终极所指没有了，话语以什么方式打动、说服人们呢？只有文学性的修辞、叙述和逼真的虚构。就此而言，离开了文学性的运作，后现代的政治行为、经济行为、道德行为、宗教行为和文化行为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后现代文学的研究应该瞄准使后现代政治、经济、道德、文化和宗教运作成为可能的文学性运作，考察在这些领域中文学性运作的方式、功能与意义，从而使后现代文学研究介入后现代的脉动。

参考文献：

- [1] 参见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见《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
- [2] [美] 乔纳森·卡勒：《文学性》，见加拿大马克·昂热诺等主编：《问题与观点》，南昌，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文学性扩张”与文艺学自我救赎的可能性

马 睿 (四川大学中文系)

当前,围绕文艺学的学科合法性和文化合法性,论争的声音越来越多,但在大方向上意见是比较一致的,没有谁断然声称应该取消文艺学,而用另外一个学科来代替它。大多数的论争都是在反思中辩护,以及为辩护而进行自我调整,具体而言就是重新厘定文艺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重新认识文艺学的学科性质。

重新寻找文艺学研究对象的冲动,缘起于“文学的边缘化”。边缘化有多重含义,一是在文学内部,文学对自身的商品属性已从以往的拒绝、勉强接受发展为今天的热情拥抱,从而文学的精神追求和艺术追求正在被文学的商业利润追求挤占;二是文学的生存空间正在被影视、网络、电子游戏等新兴文化形式挤占,文艺学的传统研究对象正在萎缩;三是跟文学相关的知识和学科在当前的文化版图中已失落了曾有的中心位置和立法权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当今人文学者不得不承认的现实。为了把更多的对象纳入自己的理论视野和学术框架以维护文艺学的学科活力,也为了保持文艺学对当下社会文化的发言权,一些敏锐的学者率先进入了被传统文艺学视为“非文学”的领域。“非文学”领域怎样才能理所当然地成为文艺学的研究对象呢?“文学性扩张”的设想为之提供了极具创造性和说服力的论证:虽然文学本身被边缘化了,但“文学性”因素已经大量进入其它文化文本以至人们的日常生活,文艺学理当运用自己的理论优势对此予以关注,参与解说这些全新的文化现象,生产新的理论话语,当然,在此过程中也实现自身的学科增殖,重新获取合法性,成为当下知识生产中的重要力量。

为什么文艺学需要辩护?现有的辩护有效吗?“文学性”是怎

样产生的?“非文学”大举进入文艺学,将怎样改变文艺学的学科性质?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我们有必要走进中国文艺学的历史。

一

文艺学是什么?它是现代学术体系中的一个学科,是现代知识谱系中关于文学的系统知识。在中国,文艺学是在20世纪才被建构起来的。从自身的学理性上讲,我们传统的文论不等同于今天的文艺学,但二者具有文化位置上的相似性,都是围绕文学进行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然而,“文学”本身却是可疑的,它指向的具体对象并不固定,作为一个概念,“文学”是被建构的,是一个流动性的不稳定概念,这种流动性使得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艺学的言说对象并不是完全重合的,所以它们只具有位置 and 功能的相似性,却不是同一个学科,在学术史上不能不加限制地对位和互换。在传统的“文学”概念中不可能产生现代的文艺学,而现代的“文学”概念也很难认同传统文论的大而化之。在此,我们实际上已触及到这样一个问题:文艺学的学术生命与关于“文学”的现代性界定息息相关。

“文学”界定包括性质界定、范围划分和功能认定,在其中起杠杆作用的是性质界定,也就是“文学性”问题。每一次对“文学”和“文学性”的界定发生重大变动、重大调整,几乎总会导致文学知识和相关理论话语的全盘改观,或者说,一切关于文学的知识,都是在对自身的反省中重新认识“文学”,同时也重塑自身的知识形态。

晚清以来,正经历了这样一次变动,其结局就是文艺学的建立。

汉语中的“文学”一词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具有丰富而含混的意义,在西方知识话语介入之前,它主要是一个对所有文字文本的笼统总称,不是特指其中的某一部分。传统文论并非没有注意到其中有些文本以“沉思瀚藻”、“缘情绮靡”为重,但一直无法为之命名,无论是六朝的“文笔之辨”还是阮元的“彰彰”,都是昙花一现,未成气候,未被传统文论广为接受,所以这些文本长期以来一直分属于诗、词、曲、赋,无法因其共同的“沉思瀚藻”、“缘情绮靡”的“文学性”统属在一个名称之下。没有命名,也就标志着传统文论根本没有重视这些文本的这种一致性,更没有用这种一致性来跟其它文本进行区分,因而诗、词、曲、赋的形式特征也好,情感特征也好,都只具有文体的意义,而没有被视为“文学性”,不具有作为文学本质的形而上意义。西方文学观念和美学理论的输入,把那些形式特征和情感特征确定为文学的“审美”本质,改变了中国传统文论中“文学”、“文学性”的无名、

隐匿状态。

“文学”一词的现代用法，最早产生于西方传教士对“literature”的翻译。艾儒略（1623年）、裨治文（1838年）等人都曾以“literature”之意使用过“文学”一词，在作为汉语词汇的“文学”中植入了异质性因素，但这种新用法对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变化出现在1844年，魏源《海国图志》在介绍传教士著作的同时也介绍了他们所使用的新词，其中就有作为“literature”的“文学”，“墙内开花墙外香”，《海国图志》很快在日本产生广泛影响，日文开始使用“文学”（bungaku）与西方的“literature”对位。后来，当汉语又大量从日文中借用新词的时候，“文学”与“literature”的等同关系才在汉语经验中真正建立起来。^[1]“文学”的这一“旅行”过程几乎与《海国图志》的命运一样，都是因为对日本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才反过来引起国人的关注。需要说明的是，“literature”在西方语言中也可以泛指“文献”和“著述”，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①，汉语“文学”一词的原有意义可以对位于广义的、泛指的“literature”，至于它与狭义的、特指的“literature”对位，则是外来语对母语的意义增殖，可见在对“文学”的现代界定中，是西方知识起到了主导作用。后来，汉语知识界感到“文学”一词固有的含混性极有可能使新知识、新观念同化于旧传统，曾使用加了限定和修饰的“纯文学”、“美文学”、“狭义文学”一类的术语来指称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以示与传统文学观念的区分，并围绕这些术语，对文学的性质、范围、功能进行了大量的辨析和论证，王国维、鲁迅、周作人、刘师培、黄摩西、刘半农等学者，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诸多文学史家，都有大量相关论述。同时，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学科分类、课程设置也及时反映了新的“文学”定义，成为新定义取得合法性的重要标识。这一系列的知识生产，对中国现代文艺学的建立具有举足轻重的奠基作用。

二

清理当时知识界关于“文学”一词的辨析，我们发现，20世纪以来的文学知识相对于传统已经发生了诸多重要变化。把什么性质确立为理想中的“文学”应有的、特有的性质，新文学给出了与传统不同的答案，而新文学对

^① “literature”的现代含义“文学”才不过百十年。1800年之前，“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其他欧洲语言中的相似词指的是“著作”或者“书本知识”。参见〔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